

延安时期怎样学习毛泽东著作

□ 王东仓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锻造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中，通过强化出版工作、建立学习制度、规范学习方法等措施深化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对于推动全党“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对进一步增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自觉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强化出版工作

学习著作，出版先行。延安时期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数量众多，为学习毛泽东著作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据《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等相关材料粗略统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撰写或参与撰写的批语、题词、诗词、电文、书信、讲话、文章等著作总计约3100余篇，延安时期著作仅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书信集》的就达1578篇左右，占比超过了50%。在这些著作中，除了一部分事务性、时效性强的文献仅出版一二版外，那些阐释重大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的文献，则以单行本和汇编本的形式一版再版，适应了不同区域、不同对象的学习需要。

据不完全统计，延安时期由出版机构出版或由党的专门机构铅印、油印、石刻的数十种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中，有11种专著版本数超过了10种，其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的版本数分别高达164、193和244，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学习毛泽东单篇著作的需求。此外，毛泽东著作汇编本虽然数量相对较少并且收录著作数量也不算多，但大约12个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和27种左右的文集本、专集本、选读本以及20余种多作者合编本，收录了毛泽东较为重要和比较流行的文章70余篇，为集中学习毛泽东著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毛泽东著作还以《新金刚经》《婴儿保育法》等为名伪装或者托名出版了近30种版本，与各类教科书和《毛泽东自传》等一起，在根据地内外出版以供各类受众学习使用。

建立学习制度

延安时期党建立的一整套学习制度，为学习毛泽东著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深入开展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专门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的常态化、长效化。

一是建立两小时学习制度和学习检查制度。1940年初，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推动全党老干部大学习，建立相关学习制度。首先，建立两小时学习制度以保证学习的“持久性与经常性”，要求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时间不少于两小时，并将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确定为干部学习节用以总结经验和奖励先进。

其次，建立学习检查制度以利于进一步推进和提高学习运动，分层分类开展检查指导。比如，中央干部教育部对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总检查每四个月一次，军事机关、边区机关和中央直属机关每两个月检查一次，各支部干事会每个月检查一次，大力推进和深化了毛泽东著作的学习。

二是建立学用结合制度。1940年8月、10月间，中央宣传部先后发布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推动建立学用结合制度，把学习中共中央的决议、决定和中央领导同志有关策略的报告等列为在职干部学习的必学内容，要求干部学会在纷繁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实事求是地贯彻党的路线，提出“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坚决避免理论和实际相脱节、学用两张皮现象。这一制度的推行，客观上加大了全党对毛泽东著作特别是报告、电文、批示等类著作的学习力度。

三是建立调查研究制度和 Learning 组制度。1941年5月，毛泽东通过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关于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的决定，逐步建立起调查研究制度和 Learning 组制度，在改造主观主义学风、培育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过程中，全面深化对毛泽东有关《改造我们的学习》《农村调查》等以及收录到《六大以来》相关著作的学习。

四是建立集体学习制度。延安整风期间，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四三”决定）和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党充分掌握中央有关决定和毛泽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及反对党八股报告的精神，指定了全党必须学习的22个文件（其中毛泽东7篇个人著作和部分由其执笔的中央文件占半数以上），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中央直属机关、军委直属系统、陕甘宁边区系统等学习分委员会，建立起集体学习制度，把学习毛泽东著作与整顿作风、提升党性紧密结合起来，为建立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专门制度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后，刘少奇明确要求，“一切党校和训练班，必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须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一切党报，必须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了适应一般党员的水准，党的宣传部门，应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编为通俗读物”。至此，党内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制度逐步成熟。

规范学习方法

延安时期，毛泽东著作往往以笔记、文章、演讲、报告、电文、批示、诗词甚至图像等不同形式存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式方法自然也就多种多样，大约可以概括为默读、吟诵、观看、听讲、泛览、精读、批改等方式。在众多学习方式中，听讲则是学习最及时、综合感受最强烈的一种。关于听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习仲勋回忆：“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萧三也高度评价毛泽东的报告、演说、讲话，是那样明白、浅显、通俗、动人，富于幽默、妙趣横生，在同一会场里，工人、农民、兵士、老太婆们听了他的讲话不以为深；大学教授、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

在深入开展集体学习活动中，学习方法也越来越规范。“四三”决定曾对学习作出如下严格规定：“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然后逐件或几件合并开小组会讨论，必要时由中央及本部派人作报告。在阅读与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仅就写笔记这一种学习方法而言，毛泽东曾在《关于整顿三风》报告中严格要求，无论是文化人还是“武化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新干部还是老干部、无论学校还是机关“都要写笔记”。

随着整风学习的内容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毛泽东著作，精读、写笔记、讨论、听报告等延安整风运动必备的学习方式便成为毛泽东著作学习的规范方式，学习成效也越来越显著。陕甘宁边区一位县长曾讲，“现在文件一学，才知道过去是‘老母鸡戴串铃，装大牲口’。文化低，没理论，只有狭隘的经验，在原脚地上转圈子，不能开步往前走，要开展工作和提高工作质量就没办法，就是有一肚子经验，也说不漂亮，写不漂亮，还是空事。这次在延安赶上整风，能学习、能听课，真美”。显然，关于整风学习认知的转变，某种程度上正是学习毛泽东著作成效的集中体现。

三千志士用身躯铺就“天路”

——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碑文敬读

□ 石永程 杜 倩

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坐落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南部、拉萨河北岸。1984年12月25日，川藏、青藏公路通车30周年纪念日，经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在拉萨市修建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纪念碑高20米，由平台、碑座、碑身三部分组成。为体现民族特色，碑座下部设计为莲花座，上部设计为藏式挑檐。碑身顶部有醒目的公路路徽，使纪念碑更突出了公路交通的寓意。纪念碑呈三角造型，有三个碑面，每面从下往上，逐步变窄，仰视而去，仿佛一条路，直插云霄。正面为胡耀邦题写的碑名——“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对着民族路，背临拉萨河，空间辽阔，巍峨壮观。另外两个侧面下方，分别镌刻着藏、汉语碑文。碑文如下：

建国之初，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增进民族团结，建设西南边疆，中央授命解放西藏，修筑川藏、青藏公路。

川藏公路东自成都，始建于一九五零年四月；青藏公路北起西宁，动工于一九五零年六月。两路全长四千三百六十公里，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同时通车拉萨。

世界屋脊，地域辽阔，高寒缺氧，雪山阻隔。川藏、青藏两路，路险江攀横断，渡通天越昆仑，江河湍急，峰岳险峻。十一万藏汉军民筑路员工，含辛茹苦，餐风卧雪，齐心协力征服重重天险。挖填土石三千多万立方，造桥四百余座。五易寒暑，艰苦卓绝。三千志士英勇捐躯，一代业绩永垂青史。三十年来，国家投以巨资，两路几经改建。青藏公路建成沥青路面。高原公路，亘古奇迹。四海闻名，五州（洲）赞叹。

巍巍高原，两路贯通。北京拉萨，紧密相连。兄弟情谊，亲密无间。全藏公路四通八达，经济文化繁盛，城乡面貌改观。藏汉同胞，歌舞翩跹，颂之为“彩虹”，誉之为“金桥”。新西藏前程似锦，各族人民携手向前。

值此两路通车三十周年，感谢中央，缅怀英烈，立石拉萨，永志纪念。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立
公元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
五日
藏历十六绕迥阳木鼠年十一月三十日

碑文简要介绍了川藏、青藏公路修建的历史背景、时间节点、里程概况，深情讲述了修建两路的重重困难，颂扬了藏汉军民的伟大业绩，阐释了奇迹般的高原公路修筑的重大意义，衷心表达了对中央的感激之情，同时深切缅怀为修筑两路牺牲的革命先烈，寄托无限哀思。

平均每公里“天路”就长眠一位烈士

1949年7月，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挑唆、策动下，制造了“驱汉事件”，企图乘国民党政权覆亡之际将西藏地方从中国分离出去。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制造“西藏独立”的阴谋，完成对全国大陆的解放，1950年1月初，中共中央作出进军西藏的决策。然而进军西藏，交通及补给面临巨大难题。毛泽东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

1950年4月，康藏公路（1955年改为川藏公路）开始修建。同年6月，青藏公路动工。修路到雪域高原，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11万军民组成修路大军，以“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在空气稀薄、高寒缺氧、乱石纵横的恶劣环境中，用血肉之躯向前修筑进藏公路。

川藏公路东段最险要的工程在雀儿山，那里海拔在5300米左右，常年积雪、高寒缺氧，素有“雀儿山五千三，飞鸟也难飞过山”之称。雀儿山是一座板岩山，必须要用大锤和钢钎打出炮眼，再用火药炸开路。

1951年12月10日中午，张福林发现有几个大炮眼装药太松动，还没来得及吃饭，就立即投入到炮眼火药的调整工作。然而这时，一个2立方米左右的大石头突然掉落，砸在了他的腿部和腰上。当其他同志

发现他时，只见他脸色苍白，已陷入昏迷。几分钟后，他慢慢苏醒过来，第一句话便是对指导员说：“我不行了，衣袋里还有些钱，请拿去帮我交上最后一次党费吧！我对不起党，再也不能为人民工作了。”卫生员赶来后，准备给他注射强心剂，他用手推开，用沙哑的声音说：“反正我不行了，还是替国家节省一支吧！”当大家把他抬上担架，他挣扎着表示要同志们赶快上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张福林还想着修路。

像张福林一样，一心想着打通“天路”的英烈还有很多。比如：满怀希望、梦想着“光荣的（地）开着卡车去拉萨”、却因翻车不幸牺牲的劳动模范吴振斌；炸山时不幸被炸起的大树树干砸中头部、牺牲在去医院路上的廖森荣；在西藏八宿县怒江边因公牺牲的18岁烈士金福礼……据不完全统计，修建川藏、青藏公路共有3000多军民牺牲，平均每公里就长眠着一位烈士，特别是在修筑川藏公路二郎山险峻路段时，每公里就有7位军人牺牲，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3岁。

在世界屋脊上架起通往北京的“金桥”

从1950年至1954年，军民团结一心、踏冰卧雪、历经艰险，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穿过峭壁悬崖、越过雪山深谷，历经千辛万苦、排除千辛万苦，五易寒暑，先后共挖填土石3000多万立方，造桥400余座，奋力修筑了通往高原的“英雄之路”。

1954年12月，两条公路同时修到拉萨。同月25日，西藏拉萨、西康雅安、青海西宁的各族各界群众，同时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1955年2月2日，毛泽东授予康（川）藏、青藏两条公路筑路人员锦旗，锦旗上绣着他为两条公路通车



的题词：“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

川藏、青藏公路是11万军民用汗水、鲜血和生命铺筑的，是团结友爱的辉煌结晶。三千志士的英勇牺牲，铸就了雪域高原上不朽的丰碑、创造了伟大的人间奇迹。“两路”通车，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的历史，极大地加强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联系，使得沿线地区各族人民的联系更加密切，特别是促进了西藏地区建设事业的发展，使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人们称赞两条公路是在世界屋脊上架起了通往北京的“金桥”。

如今，两条公路几经改建，西藏城乡面貌极大改观。在修筑、改建、养护的过程中，铸就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激励着各族人民为新疆建设而不解团结奋斗。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保卫井冈山的独胆英雄”张文彬

□ 王桂环

敌军发起猛攻后，敌军退至股家洞一带。红军前后夹击，歼灭危宿钟师一个团，危宿钟慌忙率残部退守金井。红八军沿平（江）长（沙）大道直逼金井，红五军绕道从左后方包抄金井，激战数小时，终于冲破敌军防守。

国民党军急派4个旅防守在粟梨市一带。7月27日，邓萍、张文彬率红五军在七里港与敌军展开激战。张文彬在左腿中弹的情况下，带伤继续指挥战斗。后在红八军和湘鄂赣边区各县赤卫队的全力配合下，红五军于28日胜利攻克长沙城。这是红军时期唯一攻占的省城，“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

立足西安，联合抗日。1930年冬，张文彬率部进入中央苏区，相继参加了第一、二次反“围剿”、长征和东渡黄河。

1936年夏，张文彬秘密来到西安，领导西北地区党组织和西北军的统战工作。抵达西安后，经宪兵营长金岗生的安排，他持毛泽东的亲笔信，面见杨虎城，解除其思想疑虑，并在杨虎城军队里建立联络站，使之成为红军和西北军之间的秘密通道。

接着张文彬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救亡团体。鲁迅逝世后，他联络西安有名望的“八大家”老先生中的四家出来主持悼念。以这些老先生名义邀请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等人参加，率先把西安文化界发动起来。

他亲自担任总指挥，领导西安人民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的声势浩大的请愿游行。游行当天

发生了警察打伤学生事件，群情激愤之时，他及时引导请愿群众转赴临潼谒蒋介石驻地，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文彬向中央代表团汇报了事情经过、有关人员的思想动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谈判期间，又协助周恩来做了很多具体工作。当西安爱国军民普遍要求杀蒋抗日时，张文彬打了一个比方：一家两兄弟正在打架，突然外面来了伙杀人放火的强盗，该怎么办？是继续打下去呢，还是先团结起来撵走强盗？使大家迅速认清了形势。

不畏艰险，重建广东党组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文彬继续留在西安做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七七事变爆发后，张文彬奉命抵达广州，领导广东等地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他不畏艰难险阻，往返于广州、香港之间，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会成立，张文彬当选为书记。到1938年5月，中山中心县委、东莞中心县委、南顺工委以及南雄、韶关、惠阳等地中心支部先后建立，很多过去遭到严重破坏的县、党组织，也相继恢复。他提出，“为建立强大的群众性的广东党而奋斗”。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到同年10月，广州地区（包括香港）党员人数骤增至2500余人，潮梅地区发展到2000余人，琼崖发展到5000余人。从1938年至1939年9月，县一级党的组织机构在全省各地普遍建立起来，并分别建立了东南、粤中、东

江、西江、北江和南路等特委。

张文彬重视也善于做统战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大批群众抗日救亡团体名义上是国民党领导，实际上都接受了中共的领导。他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原则，1939年冬，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逆流严重危及广东。他及时制定“政治上的进攻和组织上的保守（密）”的策略。撤出在敌部的同志，保存党的骨干力量。1941年，面对即将大举进攻惠州的国民党军队，他要求大家根据毛泽东所讲的“老子”“重耳”“礼记”三原则办事。毋为天下先，可以“后发制人”；“退避三舍”，诱敌深入以分散敌人兵力；“来而不往非礼也”，紧握枪杆子，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断言：“熬过困难就是胜利”！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张文彬同廖承志一起周密布置，在他们的努力下，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等七八百名知名民主人士和重要文化人从香港日军的严密控制下成功转移出来。

1942年6月初，张文彬在广东大浦不幸被捕。1944年8月26日，年仅34岁的张文彬在身患肺炎又饱受酷刑折磨后，在狱中去世。他在遗书《我誓死不能转变》中表达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表示：“誓死而归，乐于就义，愿为江西人，尤其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儿女留此正气吧。”

党史人物